

明月

四十年

精品文丛

四海红楼

〔上〕

余英时 周策纵 周汝昌等著

作家出版社



四海红楼

余英时 周策纵 周汝昌等著

作家出版社

群星灿烂月华明（总序）

金 庸

《明报月刊》创办人及第一任主编

《明报月刊》创刊十周年时，我写了一篇纪念文字，题目是《“明月”十年共此时》。《明月》最初十年是相当艰苦的，过的是寂寥的岁月，作者不多，读者也不算多，在学人之间没能引起多大注意。在我担任总编辑期间，我常去日本，独自在东京神田町的旧书店中翻阅尘封蛛缠的旧书，冀望发现一些可以用作插图的旧图片，那时的心情也是寂寥的。

后来情况渐渐改善了，我们的处境也好了一些。读者多了起来，作者群也渐渐扩充了。读者们翻阅二〇〇〇年《明月》的总目录，可以发现，我们的作者几乎包括了海外与中国文化知识有关的各家各派人士，真正可以说得上是“群星灿烂”。《明月》的主持人与编者受到过各种各样的攻讦，然而受得多了，也就不在乎了。真正的炸弹包我们也收到过，一些文字上的诬蔑算得了什么。

中国自和西方思想接触以来，出版过很多极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例如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其后的《新青年》《语丝》《新月》《创造》

《小说月报》，台湾的《文星》等等，都曾对当时的文化界、知识界起过介绍新思想、讨论新问题的作用。《明月》和这些前辈刊物相比，以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深，作用之大而论，自然是万万不如，所刊载作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深度，到目前为止，恐怕也是有所不及，然而我们还在继续出版，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将来还有长远的前途。我们的作者包括了全世界的华人，方面之广，大概已超过了上述那些前辈刊物，所介绍和讨论问题之广泛，大概也已超过。看情形，《明月》今后一定会愈来愈精彩。希望将来再刊登一些外国学人的中文作品或外文作品的中文译文，成为一份国际性的中国文化刊物，既有深度又能普及，那时才真正是“群星灿烂月华明”了。

目录

群星灿烂月华明 (总序) 金庸 1

上 部 “明报”红楼考

第一编 红学基本观

- 4 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
—— 一个学术史的分析 余英时
- 25 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 周策纵
- 34 红学讨论的几点我见 赵冈
- 36 索隐与自传说闲评
—— 有关《红楼梦》的研究 俞平伯
- 41 从靖应鹄藏抄本《红楼梦》谈红学考证的新问题 赵冈

第二编 红楼版本考

- 58 戚序有正本《红楼梦》的始末 宋淇
- 74 澄清我调查《靖本石头记》下落的几个问题 尹延宗
- 85 程高排印本《红楼梦》的版本问题 赵冈

- 98 读列宁格勒《红楼梦》抄本记 潘重规
- 116 初详《红楼梦》
——论全抄本 张爱玲
- 129 “冷月葬花魂”与《西青散记》 潘重规
- 141 论“冷月葬花魂” 宋淇
- 157 从曹颀的笔迹看《石头记》抄本 赵冈 陈钟毅
- 164 论“抽样”之不可靠
——曹颀的笔迹与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的抄者问题 徐复观
- 168 曹颀的笔迹
——再答徐复观先生 赵冈

第三编 真假难辩细说曹

- 174 曹雪芹摆脱包衣身份的考证初稿
——由《曹雪芹故居之发现》谈起兼纠有关曹雪芹生平的
若干错误看法 高阳
- 192 曹雪芹故居之发现及其他 黄庚
- 207 夹道中分荣国第
——恭王府确是荣国府 周汝昌
- 221 真伪难辨的“曹雪芹墓碑”公案 思藻
- 225 《红楼梦》作者的铁证
——参观中文大学《红楼梦》研究展后书 四近楼
- 240 赵冈《红楼梦新探》的突破点 徐复观
- 266 与徐复观先生论红学考证 赵冈
- 272 我希望不要造出无意味的考证问题
——敬答赵冈先生 徐复观

第四编 红学往来争鸣

- 280 致潘重规先生书 赵冈
- 287 《读红楼梦新探》余论
——答赵冈先生 潘重规
- 297 由潘重规先生《红楼梦的发端》略论
学问的研究态度 王世禄
- 316 谁“停留在猜谜的阶段?”
——答《由潘重规先生〈红楼梦的发端〉略论学问的
研究态度》一文的作者 汪立颖
- 326 敬答中文大学《红楼梦》研究小组汪立颖女士 徐复观
- 341 诤赵、潘的红学论 四近楼
- 354 读《红楼梦新探》 潘重规

下 部 梦的鸿冥

第一编 梦的世界

- 374 假作真时真亦假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赵冈
- 385 “眼前无路想回头”
——再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兼答赵冈兄 余英时

第二编 详“梦”说曹

- 426 论曹雪芹撰《红楼梦》的构想 牟润孙

- 443 曹雪芹为什么自我挖苦?
——“曹、贾”二字各处极刑的探索 陈蝶衣
- 452 曹雪芹是社会工作者 赵冈
- 459 脂砚斋和高鹗
——读周汝昌新版《红楼梦新证》 纳逊
- 466 空空道人十六字闲评释 俞平伯
- 468 从曹雪芹“继妇”悼诗谈到曹雪芹的卒年 潘重规
- 473 曹雪芹故居的疑问 谈锡永
- 479 曹雪芹故居的问题 赵冈

第三编 红楼杂论

- 488 《红楼》二论 宋淇
- 495 《红楼梦》里的小红 汤晏
- 500 《红楼梦》识小 宋淇
- 508 论贾宝玉为诸艳之冠 宋淇
- 542 薛宝钗和冷香丸 宋淇
- 547 王熙凤的不治之症 宋淇

第四编 细观红楼

- 566 《红楼梦》的瑕疵 李拓之
- 585 “蘅芜院”与“潇湘馆”
——题额尽是出于《水绘园同人倡和集》 陈蝶衣
- 593 “潇湘馆”来历的补充 陈蝶衣
- 598 漫说芙蓉花与潇湘子 俞平伯

602	红楼经历		
	——读周汝昌新版《红楼梦新证》		纳逊
610	论大观园	宋淇	
633	《红楼梦》“汪恰洋烟”考		周策纵
640	红楼边角	刘心武	
644	食在红楼		
	——《红楼梦》的饮食文化		朱建新

从历史走廊穿行过来的《明报月刊》

——《明月四十年精品文丛》编后记 潘耀明 659

上 部

“明报”红楼考

第一编

红学基本观

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

——一个学术史的分析

余英时

在 20 世纪的中国,《红楼梦》可以说是最受重视的一部文学作品。近五六十年以来,研究和评论《红楼梦》的文字,如果全部收集在一起,恐怕会使“汗牛充栋”这个古老的陈语失去它的夸张意味。我们知道,还在清代晚期,北京的文士便已嗜好《红楼梦》到了一种“开口必谈”的地步。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红学”一词也开始流行起来了。如果说清末的“红学”还只是一种开玩笑式的浑号,1921 年以后“红学”(亦称“新红学”)则确实已成为一种严肃的专门之学。由于胡适的提倡,《红楼梦》的考证工作已和近代中国学术的主流——从乾、嘉考据学到“五四”以后的国故整理——汇合了。因此,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红学”无疑地可以和其他当代的显学如“甲骨学”或“敦煌学”等并驾齐驱,而毫无愧色。

但考证的红学发展到今天已显然面临到重大的危机。如所周知,近代新红学的最中心的理论是以《红楼梦》为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自传说虽远在 18 世纪即已由袁枚(1716—1798 年)道破,但事实上直到胡适的考证文字问世以后,才逐渐地得到文献上的证实。所以鲁迅认为《红楼梦》乃作者自叙,“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可是就今天海外——尤其是香港——所能见到的红学讨论而言,鲁

迅在1923年所谓“确定”者，似乎又变成不甚确定了。近二十年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自传说至少已受到三种不同的挑战：第一种是出于索隐派的复活；第二种起于“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论”；第三种则来自对于《红楼梦》本身所包含的“理想性”的新认识。关于这三种挑战，我们在下文将会分别地有所说明。而目前最使我们困惑的问题则是红学考证何以发生如此严重的危机？难道说五十年来许多第一流学者的考证功夫都白费了吗？难道乾、嘉以来号称实事求是的考据学完全没有任何客观的基础吗？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学术史的观点来检讨一下近代红学发展的历程。依我个人的看法，目前红学的危机主要是来自它的内部，只有先弄清楚这个危机的性质，我们才能为红学研究寻找出一条可能的新路。

我必须先解释一下所谓“学术史观点”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在上面用了“危机”一词。这个名词并不是泛指；它来自孔恩(Thomas 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那部名著。孔恩在该书中还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中心观念，即所谓“典范”。由于“典范”和“危机”这两个观念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近代红学的发展，我愿意简略地讲一讲孔恩的方法论。

根据孔恩的理论，一切科学革命都必然要基本上牵涉到所谓“典范”的改变。那么，“典范”究竟是什么意思？孔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于“典范”这个中心观念有极详细而复杂的讨论。但简单地说，“典范”可以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典范”指一门科学研究中的全套信仰、价值和技术，因此又可称为“学科的类型”。狭义的“典范”则指一门科学在常态情形下所共同遵奉的楷模。这个狭义的“典范”也是“学科的类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却是最重要、最中心的部分。

孔恩的研究充分显示一切“常态科学”都是在一定的“典范”的指引之下发展的。科学家学习他的本门学科的过程，通常并不是从研究抽象的理论和规则入手。相反地，他总是以当时最高的具体的科

学成就为楷模而逐渐学习得来的。这种具体的科学成就在今天是以教科书的方式出现的；在以往则见之于科学史上所谓经典的作品，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牛顿的“原理”等等。

这正是狭义的“典范”一词之所指。“典范”不但指示科学家以解决疑难的具体方式，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提供科学家以选择问题的标准。从科学史上看，可以说一切科学研究的传统都是由于“典范”的出现而形成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既经形成之后，大多数科学家都在一特定的“典范”的笼罩之下从事“解决难题”的常态工作。他们的志趣决不在基本性的新发现，并且对叛离“典范”的异端，往往采取一种抗拒的态度。换句话说，孔恩的“典范”颇近乎怀特黑（A. N. Whitehead）所说的“基本假定”或柯灵乌（R. G. Collingwood）所说的“绝对前提”。它们都是在某一个时代中被视为天经地义，而无从置疑的。而且离开了这些“假定”或“前提”，当时的人甚至不知道如何去进行思考或研究。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知道，科学史上树立“典范”的巨人一般地说必须具备两种特征：第一、他不但在具体研究方面具有空前的成就，并且这种成就还起着示范的作用，使同行的人都得踏着他的足迹前进。第二、他在本门学术中的成就虽大，但并没有解决其中的一切问题。恰恰相反，他一方面开启了无穷的法门；而另一方面又留下了无数的新问题，让后来的人可以继续研究下去（即所谓“扫荡工作”），因而形成一个新的科学研究的传统。在科学史上我们说“哥白尼的天文学”或“弗洛伊德心理学”，就是因为哥白尼或弗洛伊德是建立“典范”的开山宗师。他们在天文学或心理学方面所创树的楷模使得他们的后学不得不在长时期内埋首于“解决难题”的扫荡工作。

但是科学史上的“典范”并不能永远维持其“典范”的地位。新的科学事实之不断出现必有一天会使一个特定“典范”下解决难题的方法失灵，而终至发生“技术上的崩溃”。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危机”一词的确切涵义。科学史上“危机”的成因很复杂，有外在

的，也有内在的。就外在因素言，如以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为例，则16世纪要求历法改革的社会压力便曾加深了旧天文学传统的危机。但就内在因素言，“技术上的崩溃”是一切科学危机的核心。危机导向革命；新的“典范”这时就要应运而生，代替旧的“典范”而成为下一阶段科学研究的楷模了。当然，新旧“典范”的交替，其间并没有一道清楚的界限。有时候，早在旧“典范”如日中天之际，新“典范”即已萌芽，不过当时不受注意罢了。另一方面，新“典范”当令之后，旧“典范”也并不必然完全失去其效用。举例来说，哥白尼天文学并没有完全取代托勒密的系统。一直到今天，在推定星位的变化方面，托氏天文学仍在被广泛地应用着。

从晚清算起，红学研究史上先后出现过两个占主导地位而又相互竞争的“典范”。第一个“典范”可以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为代表。索隐写于1915年，但晚清时已有不少人持相似的看法。这个“典范”的中心理论是以《红楼梦》为清初政治小说，旨在宣扬民族主义（案：确切地说，即反满主义），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作为一种常态学术，索隐派红学是有其“解决难题”的具体方法的，即胡适所谓之“猜谜”。但“猜谜”一词显然具有贬义，对索隐派并不公允。据蔡元培自己的说法，他推求书中人物和清初历史上的人物的关系，共用三法：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广义地说，这也是一种历史考证，简单地称之为“猜谜”，似有未安。但是，蔡元培实际上乃是索隐派“典范”的总结者，而不是开创者，因此在索隐一书出版的时候，这个“典范”下的红学研究已是危机重重。索隐的方法虽然可以解决《红楼梦》中的一小部分难题，而绝大部分的难题并不能依照蔡先生的三法来求得解决。蔡先生说：

右所证明，虽不及百分之一二，然《石头记》之为政治小说，决非牵强附会，已可概见。触类旁通，以意逆志，一切怡红快绿之文，春恨秋悲之迹，皆作二百年前因话录、

旧闻记读可也。

这话未免说得太乐观了些。事实上,《红楼梦》全书此后并未能索隐派的“典范”下触类旁通。正如胡适所指出的,蔡先生以凤姐给刘姥姥二十两和八两银子的事是影射汤斌的生平,可是另外王夫人赠给刘姥姥一百两银子的事却在汤斌一生的事迹中找不到影子。因此这一次分量最重的馈赠反而在《石头记索隐》中没有交代。像这一类的困难最足以显示索隐派红学的内在危机。

另一方面,新材料的不断出现也动摇了索隐派红学的基本假定。这些新材料都好像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即《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写他自己所亲见亲闻的曹家的繁华旧梦。这个说法早在乾、嘉时代即已出现,但直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1921年)问世以后才成为一种有系统、有方法的理论。所以胡适可以说是红学史上一个新“典范”的建立者。这个新“典范”,简单地说,便是以《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其具体解决难题的途径则是从考证曹雪芹的身世来说明《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胡适的自传说的新“典范”支配了《红楼梦》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且余波至今未息。这个新红学的传统至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1953年)的出版而登峰造极。在新证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周汝昌是把历史上的曹家和《红楼梦》小说中的贾家完全地等同起来了。其中“人物考”和“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两章,尤其具体地说明了新红学的最后归趋。换句话说,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了。新证以后虽然仍有大量的考证文字出版,并且在个别难题的解决上也多少有所推进,但从红学的全面发展来看,自传说的“典范”已经陷入僵局,这个“典范”所能解决的问题远比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为少。这就表示自传说的效用已发挥得极边尽限,可以说到了功成身退的时候了。

1953年周汝昌新证出版,一方面固然是总结了考证派新红学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则也暴露了红学的内在危机。50年代中内地对自传说的开始怀疑和海外索隐派红学的复活,从学术发展史的观点来